

《帝京景物略》纂修考论*

金玲 林静

提要：明末成书的《帝京景物略》是对北京城区地方史文献产生重要影响的珍贵古籍。除了广为人知的刘侗，另一作者于奕正的京郊游历笔记为纂写该书奠定了基础。于氏因诗名进入竟陵派与复社圈子，得以与刘侗交好。在他早年游历笔记的基础上，二人合作完成该书稿本主体。崇祯八年夏以后，于氏重病，刘氏返乡，因此书稿在南京最多做过零碎修补，方逢年序“著于秣陵者经年”之说颇可商榷。《帝京景物略》还在崇祯十七年前和康熙之初被重刻，改名《燕京古迹》。

关键词：《帝京景物略》 于奕正 刘侗 生平 纂修考

《帝京景物略》（以下简称《景物略》）是记录明末北京城市风貌的重要文献，引发多位学人的关注与研究。张次溪、贺亚先、王灿炽、黄鸣、祝良文等依托于书序及两名作者刘侗、于奕正的传记，勾勒出此书纂修的大致经过。20世纪80年代初，张次溪系统介绍了《景物略》版本传承。^① 吴承学和张勃则分别介绍了《景物略》作为晚明小品文和北京民俗史的重要史料价值。^② 然而，以往研究普遍侧重在考索刘侗的生平，对另一作者于奕正和于、刘诸友人别集中的相关内容未及充分挖掘，导致《景物略》成书过程的描述与研究尚嫌粗略，遑论将其置于明代学术史和社会史的大背景中深入探究。

本文拟引入更多新史料，通过重新考察《景物略》纂修过程和于、刘生平重要细节，澄清前人对该书的种种模糊之论，以期对研究明清北京地区学术史和文学史有所裨益。

一 于奕正学术背景、交游情况与纂书关系

关于《景物略》的成书过程，以往研究大多基于该书刘侗序言和刘氏传记立论，于奕正的资料只用了《都门三子传》和该书于氏《略例》。实际上于奕正还有著作《朴草》^③、《天下金石志》传世，其生平细节散见于友朋别集，材料远比刘侗丰富。

于奕正（1595—1636）字司直，顺天府宛平县人，家境富裕。^④ 于家曾聘来京会试的学者陶奭龄为西席，奭龄从学于其兄望龄，曾随之谒见“公安三袁”之袁宏道，偕同游览东南湖山名

* 本文为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人幽燕之行及其诗歌与盛唐之音”（项目编号：20WXC011）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张次溪：《〈帝京景物略〉的著者和它的版本》，北京史研究会编：《北京史论文集》（第2辑），1982年，第249—260页。

② 参见吴承学：《〈帝京景物略〉与竟陵文风》，《学术研究》1996年第1期；张勃：《〈帝京景物略〉中的岁时民俗——对当代民俗志书写的一点思考》，《民俗研究》2010年第4期。

③ 《朴草》与《景物略》同在崇祯八年年底刊刻，原书已佚。于奕正之子于藻访求其父遗集，刻成《于司直遗诗》康熙本，今亦佚。《遗诗》先为于奕正友人周损访得，改名《朴草选》，收入陈允衡编《诗慰二集》（“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集部，第56册，第369—373页）于奕正诗歌中，《朴草选》收40首，《景物略》收12首，彼此不相重复，二者相加，恰符于氏密友王崇简回忆的52首之数。

④ 参见王崇简：《青箱堂文集》卷8《都门三子传》，“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17册，第141页。

胜,早期不第时即已在家研习《宗镜录》及参禅。^①陶氏称:“万历癸丑,余都试罢,病卧邸中。”^②可推知万历四十一年(1613),陶奭龄在京应会试,是年于癸正18岁,聘请陶氏在家设馆^③,符合常理。陶奭龄喜好游览山水,又对佛教兴趣浓厚,很可能影响到自己这位学生。于奕正“生而峻洁”“性慕幽寂”^④,又持有北京南城天坛附近“坛勺堂”^⑤和西山广慧庵旁“云上园”^⑥两处产业,方便他在读书之余踏访京城山水。于奕正的师承和生活环境促使他不断发现京郊风景的无穷趣味:“工为诗歌,好游名山……穷岩绝岫,数百里间无不周览。”去不了的地方方便“讯之故老,考之载纪”^⑦。

游历京郊,不仅激发出于奕正的诗情,更催生他的金石学兴趣。他和文社友人金铉曾结成金石学小团体“僻盟”,发誓要“胝所及,虽险岩幽壑,毕力求之。舌所及,虽堯人牧子,详悉咨之”^⑧。他本人则是“遇断碑,必披荆剔藓以识之。或攀枯萝、蹑危石,逾其绝顶”^⑨。于奕正将访求到的金石文献仿照欧阳修《集古录》形式行世,书成于崇祯五年(1632)^⑩,名《天下金石志》。^⑪该书继承《集古录》等金石目录的遗风,在明末清初文献大量散佚的背景下仍保持了体例完善。不过,该书除京城部分基本出自目验,全国各地的金石碑刻,主要根据文献和与学友的通信整理而成,非实地考察,故讹误不少。于奕正除编订金石碑刻谱录外,还致力抄写稀见金石文献旧本,曾有几种抄校本颇为当时藏书家所宝爱。例如于氏所抄宋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为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收藏,范氏又借给毛晋,得以列入毛氏《津逮秘书》传布后世。^⑫此外,于氏还计划编纂丛书《金石汇函》,收录上自《集古录》,下至《德山金石录》共16种金石文献,“按其图而求之,观则止矣”^⑬,可惜并未成书。

于奕正家资既富,为人慷慨,于是“四方来京师者,闻其名,辄往司直”^⑭,其中最重要的交游人物是谭元春和刘侗。明天启四年(1624)五月,竟陵派领袖谭元春赴都会试,初入京即得知于奕正能诗。是年秋,于奕正招谭氏同游西山,由此订交。谭元春平生不轻许可,却因于奕正的朴实气象而看重他。于奕正这边更是情谊深厚:“宝友夏一滴墨,真欲使成龙而尤恐其飞去

① 参见陶奭龄撰,李会富编校:《陶奭龄集》附录4《陶奭龄年谱》,“阳明学要籍选刊”,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90—597页。

② 陶奭龄撰,李会富编校:《陶奭龄集·小柴桑喃喃录》,第414页。

③ 陶氏有《万历癸丑余馆于司直氏今又见丑矣把臂道旧恍然有怀因纪述投赠》和《再赠门人于司直》二诗,见陶奭龄撰,李会富编校:《陶奭龄集·赐曲园今是堂集》卷3《诗·敝裘集》,第102、103页。

④ 王崇简:《青箱堂文集》卷8《都门三子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册,第141页。王崇简:《青箱堂文集》卷10《跋景物略》,“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册,第168页。

⑤ 于奕正:《朴草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6册,第369页。

⑥ 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卷13《岳归堂新诗三》,“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64页。

⑦ 王崇简:《青箱堂文集》卷10《跋景物略》,“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册,第168页。

⑧ 金铉:《金忠节公文集》卷2《于司直金石志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6册,第445页。

⑨ 王崇简:《青箱堂文集》卷8《都门三子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册,第141页。

⑩ 参见于奕正:《天下金石志》,《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史部,第886册,第23页。

⑪ 参见金铉:《金忠节公文集》卷2《于司直金石志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6册,第445、446页。

⑫ 参见毛晋为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所作跋文(“宋人著录金文丛刊”,中华书局,1986年,第398页)。

⑬ 于奕正:《天下金石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86册,第31页。

⑭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5引于奕正遗稿顾梦游序,《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34册,第380页。

也。”^① 谭元春会试不第，移居于家，他主持的诗社“长安古意社”的社友们多兼有复社成员身份，也来于家“云上园”聚会。^② 谭元春于是介绍友人刘侗与于奕正结识。

于奕正和刘侗的交游，与《景物略》编纂关系最密切，有几个问题须厘清。

第一，刘侗生于何年？论者通常根据康熙《麻城县志》：“崇祯进士，知吴县令之任，卒于维扬舟次。时年四十有四。”^③ 已知刘侗卒年在崇祯十年（1637）丁丑，据此推得其生年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甲午。按《崇祯七年甲戌进士三代履历便览》，刘侗生年在万历三十四年丙午：“刘侗：格庵，春秋房，丙午年九月初六日生，锦衣卫籍，黄州府麻城县人。癸酉顺天乡试……吏部观政，丁丑授吴县知县。”^④ 据康熙《麻城县志》计算的万历二十二年与进士履历所见万历三十四年，差了12年之多，在没有更多佐证前，我们只能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官年与实年不同所致。据陈长文研究，明代官年减岁颇为常见，以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最为严重，万历及崇祯朝时有少报年龄至11岁的例子。^⑤ 考虑到万历二十二年和三十四年都是午年，根据明清科举风气，推测刘侗利用同为午年之机少报12岁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崇祯三年（1630）刘侗到北京国子监读书，借谭元春介绍，与于奕正相识。刘侗在崇祯八年刊行的《景物略》序中自称“北学五年”，可知刘、于二人筹划该书不会早于崇祯三年。刘侗到北京时37岁，于奕正35岁，二人年龄相仿，都是诸生，同在复社。^⑥ 一为好奇爱游的京师富家子弟，一为科场失意寻求解脱的湖广名门后裔，身份相当，意气相投，兴起合作纂书的想法也顺理成章。

第二，《景物略》的纂修工作过程如何具体开展？二人都各自做了哪些贡献？于奕正本人在《略例》中说的是“奕正摭事”“刘子属辞”^⑦；刘侗序言所言还算谨慎：“奕正职搜讨，侗职摘辞。”^⑧ 刘侗乡试座师方逢年作序如此描述二人分工：“爰有于子奕正采厥事，周子损采厥诗，以佐刘生之笔华墨沈。”^⑨ 偏差正出在这里，方逢年认为于奕正和周损的工作，似乎都是辅助刘侗，于奕正不过做些采访打杂的事务，其贡献与负责选诗的周损在同一等次。

结合文献看，刘侗和方逢年的说法对于奕正纂修《景物略》的贡献评价有失公允。首先，于氏少年旧交兼姻亲王崇简证明，于奕正考察北京地理已有20年：“如是者二十年。年必有游，游必有纪。以至一物之足传，必为著其端委。岁时既久，篇帙遂多。”^⑩ 而且又有《天下金石志》这样的成果面世。相比之下，刘侗在京仅有5年，前期积累明显不足。

其次，于奕正同龄人孙承泽辑著《春明梦余录》也证明《景物略》中部分内容实际出自于

① 于奕正：《朴草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6册，第369页。

② 参见谭元春：《谭元春集》卷12《岳归堂新诗三》，第366页。

③ 康熙《麻城县志》卷7《人才志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265册，第341、342页。

④ 《崇祯七年甲戌进士三代履历便览》，天一阁博物院馆藏，索书号：善0969。

⑤ 参见陈长文：《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史学月刊》2006年第11期。

⑥ 参见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卷8，“明代传记丛刊”，明文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7册，第52、470、491页。

⑦ 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略例》，《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29册，第201页。

⑧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叙》，《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29册，第199页。《四库全书总目》据此称“奕正摭求事迹，而侗排纂成文”（《四库全书总目》卷77《史部·地理类存目六》，中华书局，2003年影印本，上册，第672页）。

⑨ 方逢年序，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29册，第195页。

⑩ 王崇简：《青箱堂文集》卷10《景物略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册，第168页。

氏之手，刘侗并未一手包办行文。如卷64《钓鱼台记》^①，直接化用《景物略》《钓鱼台记》部分文字^②，但是限于体例没去掉于氏姓名，幸亏康熙《宛平县志》收入《钓鱼台记》并明确署名^③，后人才得以找回于奕正的著作权。再如卷68《卢师山》《百花陀》《岫峒崖》3篇，都明言来自“都人于奕正”^④，也能在《景物略》中找到对应原文。据此可得出结论，至少《景物略》京郊部分的底稿，当如王崇简所言，来自于奕正早年游记，而并非像刘、方二序所言的于奕正只是提供素材而已。

综合前述，将于奕正和刘侗作为《景物略》的并列作者更符合实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本已不误：“明刘侗于奕正同撰。”^⑤张次溪进一步提出是“于奕正的原稿，经过刘侗的加工润饰”，虽然并未论证，至少没有误判作者。^⑥但是部分目录和论者被方逢年序言误导，将《景物略》作者归于刘侗一人，例如清初《日下旧闻》徐乾学序^⑦、清乾隆时殿本《明史·艺文志》的史部地理类^⑧、晚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⑨述及《景物略》时，都误将该书作者记为刘侗独作。康熙《麻城县志》甚而认为刘侗是“著书”：“取燕人于奕正所抄集，著为书，名《帝京景物略》。”^⑩王崇简或许早就预见到他的朋友日后会有此遭遇，在《景物略》跋文中强调：“其苦心积虑、经营草创，司直之功不可诬也。”^⑪在此，我们为张次溪之说补充了书证，部分著录信息遗漏了于奕正，关键在误读方逢年序。

第三，最后加入的周损是否应当计入《景物略》的作者之列？于、刘此前收集了5000多首北京名胜相关诗歌，于奕正强调他和刘侗都没有时间，才把选诗任务托付给周损：“奕正与刘子未暇选定，以属周子损。”^⑫在方逢年的笔下却变成了于奕正和周损都是辅助刘侗：“爰有于子

① 孙承泽《钓鱼台》：“在阜成门外南十里花园村，有泉自地涌出，金人王郁隐居于此，筑台垂钓。元人丁氏建玉渊亭，马文友又筑饮山、婆婆诸亭，后为李威暇别业。”《春明梦余录》卷64，康熙钞本，第2269页。

② 刘侗、于奕正《钓鱼台》：“出阜成门南十里花园村，古花园，其后村……金王郁钓鱼台，台其处……有泉涌地出……郁台焉，钓焉……元丁氏亭焉，因玉渊以名其亭。马文友……饮山亭、婆婆亭以自名。……自万历初，为李皇亲墅。”《帝京景物略》卷5，崇祯八年南京初刻本，第12册，第17、18页。

③ 参见康熙《宛平县志》卷6《古文·钓鱼台记》，“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册，第173页。

④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68，康熙钞本，第2422、2425、2442页。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77《史部·地理类存目六》，上册，第672页。

⑥ 参见张次溪：《〈帝京景物略〉的著者和它的版本》，《北京史论文集》第2辑，第259页。

⑦ 徐乾学《日下旧闻序》：“余尝病刘同人《帝京景物略》颇多抵牾。”《檐园文集》卷20，“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24册，第518页。

⑧ 明末黄虞稷入史馆前所编《千顷堂书目》著录《帝京景物略》为“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八卷”（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以《千顷堂书目》为底本的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今藏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为黄氏史馆上呈本，其内容被抄入万斯同《明史·艺文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26册，第359页），著录皆同《千顷堂书目》。但是武英殿本《明史·艺文志》则误录成“刘侗《帝京景物略》八卷”，中华书局校点本《明史·艺文志》沿袭此说。

⑨ 参见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2000年，第532页。

⑩ 康熙《麻城县志》卷7《人才志上》：“初客都门，取燕人于奕正所抄集，著为《帝京景物略》八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265册，第342页。

⑪ 王崇简：《青箱堂文集》卷10《景物略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册，第168页。

⑫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略例》，《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29册，第201页。

奕正采厥事，周子损采厥诗。”^①事实上，周损主要是协助整理已有素材，而不像于奕正贡献了书稿，故不宜将其列入作者。

由上文刘侗生年，于、刘交游，《景物略》作者问题讨论可知，此类晚明地方史文献纂修过程复杂多元，在著录版本信息和研究成书过程中，当格外审慎。

二 于、刘南京之行与《帝京景物略》刊刻

崇祯七年（1634）春刘侗考中进士。九月九日，刘侗南下，于奕正送别时，见秋气方佳，即附舟同行。^②此次南游关系到《景物略》的刊刻，前人未曾对此深入研究，笔者将解释于奕正的南游动机和详情，还原于、刘寓居南京前后的具体情状。

于奕正南游有其深层动机，并非心血来潮。约在崇祯四年（1630），于氏忘年交葛一龙自云南任上辞职到京，整理诗集《滇游草》，于奕正应邀作序，文中表达其不愿“胸无万卷，足无万里，文累百千，语同儿女”，希望“从先生学诗舟车间”^③。崇祯五年于奕正刊行《天下金石录》时，刘侗《略述》即暗示：“四十将游，匪终燕人。”很可能因为此前于奕正纂《景物略》、编《天下金石志》，与各省来京的友人交流，发现自己人过中年，游踪却未出帝都（“司直生长四十年，未一日去其家”^④），不免遗憾，激发了壮游天下的想法，所以刘侗才在《天下金石录》序言中勉励朋友“匪终燕人”。崇祯七年春，谭元春会试不利，返乡前邀请于奕正到自己的家乡承天府竟陵县游访。是年于奕正39岁，正合前文《略述》所言“四十将游”。恰逢刘侗南下，于奕正遂借此机会与之同游。

崇祯七年底，于、刘抵达南京，他们身为复社成员，先与南京复社诸人往来，八年冬至后，《景物略》付梓。^⑤方逢年序称：“周咨于燕者五年，著于秣陵者经年。”^⑥于奕正《略例》对此说得比较模糊：“历春徂冬，铢铢纳纳而帙成……《帝京》编成，适与刘子薄游白下，朝游夕述。不揆固陋，将续著《南京景物略》，已属草矣。”^⑦仅读这两条序文，给人一种印象：崇祯八年中，刘、于二人都在南京孜孜纂写《景物略》稿件。《南京景物略》草稿也在准备中。清初宋荦甚至据此认为《南京景物略》已有成稿，遗憾未能找到：“麻城刘同人侗著《南京景物略》未成。余宦黄时，求其遗稿不可得。或曰为好事者窃去。”^⑧关于从纂修成稿到刊行这一段时间的史实考辨，张次溪以为二人南游在崇祯七年，指出王崇简错记在八年，又承袭宋荦对《南京景物略》的误解。^⑨王灿炽则全袭张说。^⑩可是细致梳理崇祯八年二人的行程，不难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① 方逢年序，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29册，第195页。

② 参见于奕正遗稿顾梦游序，《因树屋书影》卷5，《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34册，第381页。

③ 于奕正：《滇游草原序》，《葛震甫诗集·佛客斋集》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3册，第619页。

④ 于奕正遗稿顾梦游序，《因树屋书影》卷5，《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34册，第381页。

⑤ 刘侗《叙》署名：“崇祯八年乙亥冬至后二日麻城刘侗撰。”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29册，第199页。

⑥ 方逢年序，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29册，第195、196页。

⑦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略例》，《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29册，第201页。

⑧ 宋荦：《筠廊二笔》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子部，第114册，第703页。

⑨ 参见张次溪：《〈帝京景物略〉的著者和它的版本》，《北京史论文集》第2辑，第250、255页。

⑩ 参见王灿炽：《〈帝京景物略〉及其作者考》，《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我们先看于奕正行程。王崇简称于奕正以南京为出发点,“遍历名胜”^①,谭元春则称其“吴越遍游”。各家或遵从王、谭之说,或语焉不详。

考《谭元春集》,崇祯八年(1635)夏,谭元春从庐山寄诗给于奕正:“欲持庐岳好晴岚,寄汝香山涧底参。吴越遍游归自急,退之原不乐江南。”^②细揆诗意,本年夏谭元春居于庐山,得知于奕正在苏州(“寄汝香山涧底参”),所谓“吴越遍游”,当是因苏州之行连类而及。谭元春以为于奕正急回南京,是北人不服江南水土(“退之原不乐江南”)。但复社友人顾梦游讲述的故事中却呈现出另一重面相:于奕正以为他此前在北京招待了各地朋友,这次他到江南,这些曾经受过他款待的朋友应该热情回馈才对:“以为身之四方,可以取给尽欢一如其家耳。”不料却遭受冷遇,因此情思郁结:“孰知语游于今,既有难言者,而司直伉爽实甚,顾不免于郁郁。”于奕正七情内伤,不免致病,不得不回南京养病:“虽所至倾动,而意不自展。返于白门,神色微异。”^③因此于奕正游吴之事实有,而游越之事并未成行,可从他与方以智的交往中得到佐证。

崇祯八年春,于奕正和刘侗在南京结识离乡躲避兵灾的方以智。同年夏,方氏到苏州虎丘寺访自扁和尚;此前于奕正未能赴竟陵访问谭元春,很有可能就改游苏州;于是在虎丘寺二人重逢,订下同游杭州西湖之约:“一揖虎丘寺,白门数月心。……西湖秋月好,同往踏阴森。”^④但立秋之后,方以智游杭旅伴换成了陈名夏^⑤,而于奕正的行踪在方氏诗文中消失了。可见二人并未偕行。原因是这年秋天,于奕正病情严重,到了“生存死际怀”的程度,有朋友甚至送来了人参之类的贵重药品^⑥,自然无力出游。

再看刘侗的本年行程。刘侗的著作《麟经新旨》在这一年春天刻成。^⑦顾梦游称,这段时间里“刘子亦分路入宛,(于氏)乃成独游”^⑧。考虑到崇祯九年夏于奕正即离世,崇祯十年刘氏本人亦去世,只有崇祯八年才能出现二人分路、各自独游的情况。由此可推知,刘侗在南京只待到了崇祯八年初夏,有两条材料可支撑此说。

其一在于奕正的《淩波沙招集木末亭》,该诗列于在南京所作诗中,且排在崇祯七年除夕之后,题注称“同王芥庵、汪叔猷、刘同人、伯执□王公省公”,可见这次聚会有刘侗参加。诗首“残阳收木末,深绿渐成烟”^⑨一句,只能指崇祯八年的春末夏初。其二是刘侗《久游复至鄂得家信将别黄宗之》:“出门未暑秋仍滞,十度曾登送别舟。久客畏闻家有信,逢人俱道邑无收。”^⑩刘侗暑热未起时从南京出发,秋天还在鄂州,鄂州位于黄石与武汉之间,长江沿岸,往

① 王崇简《都门三子传》:“崇祯乙亥,偕同人取道秣陵,遍历名胜。”《青箱堂文集》卷8,“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册,第141页。

② 谭元春:《谭元春集》卷19《岳归堂未刻诗六至九》,第540页。

③ 于奕正遗稿顾梦游序,《因树屋书影》卷5,《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34册,第381页。

④ 于奕正:《朴草选·吴越间再逢密之遂订西湖之游》,“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6册,第373页。方以智《龙眠后游记》:“乙亥游东越。”《浮山文集前编·稽古堂二集》卷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册,第456页。

⑤ 参见方以智:《方子流寓草》卷5《立秋饮云子、草臣轩中,分得名字,时余与百史将发矣》,“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0册,第704页。

⑥ 参见于奕正:《朴草选·秋病》,“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6册,第373页。

⑦ 参见刘侗:《麟经新旨·序》,崇祯八年三台馆刻本。

⑧ 于奕正遗稿顾梦游序,《因树屋书影》卷5,《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34册,第381页。

⑨ 于奕正:《朴草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6册,第372页。

⑩ 朱彝尊选编:《明诗综》卷73《刘侗》,中华书局,2007年标点本,第3419页。

北可至刘侗的故乡麻城。^①他在诗中说自己“久客”，又提到回乡路上得到家信，回乡探亲的可能性更大。

有论者以为刘侗考上进士后流宕于南京，“有官而不就任，宁愿落拓江湖以死”，体现了明末清初士人的避官风气。^②这一解释没有考虑到明代进士中举后的一个惯例：“近来新科进士选期未及者，多以给假省亲省墓为辞，得暂归里。”^③前文引用刘侗进士履历，提及“吏部观政”。对当时的刘侗来说，观政和候选都需要时间，正好趁此空当去南京办点私事：比如在南京刊刻自己的著作《麟经新旨》和与人合作的《景物略》，顺便游览南都胜景，并在此中转回乡。所以崇祯八年他在南京只待到夏天就回麻城了，不能算“流宕”，更谈不上“避官不就”。

综上所述，崇祯八年春天和初夏，刘侗和于奕正在南京登临名胜，“朝游夕述”确有所本，游览经历也能在《朴草》诸诗中得到印证。盛夏，于奕正赴苏州游历，刘侗则动身回故乡麻城。自秋至冬，于奕正在金陵寓舍缠绵病榻，刘侗则在回乡路上滞留鄂州。冬至前后，于奕正应是大病初愈，才有精力完成《景物略》和《朴草》的梓行。

总之，于、刘二人到南京后，专心打磨《景物略》定本、收集《南京景物略》资料的时段，只能在崇祯八年春天。再据于氏所言“《帝京》编成，适与刘子薄游白下”，有理由推断，《景物略》用于刊刻之稿本至迟当在崇祯八年上半年，亦即于、刘在南京分道独行之前就已完成。至于《南京景物略》，大概率只是个写作计划，连草稿恐怕都未必有。张次溪和《景物略》1963年点校本的整理说明皆以为《南京景物略》残稿今已不传，言下之意是此书曾有成形书稿。^④据前文考证，此说颇可商榷。

《景物略》的崇祯八年初刻本，张次溪统计明亡之前有翻刻本3种，清代又有4种重要的翻刻本，坊本不计其数。^⑤此外，该书尚有异名同书之重刻本，名《燕京古迹》，可能已佚。该书一开始在北京书市上并不算畅销：“书蚀蠹不易读，识者惜之。”^⑥刘侗的朋友、无锡人方弱当时客居北京，见此情形，重刻一版，不名《景物略》而称《燕京古迹》。不久明朝灭亡，这批崇祯时的书版也随之灰飞烟灭。康熙初，方弱再次刊刻《燕京古迹》一书，嘱好友张自烈作序，我们从张序中得以窥见该书流传的部分细节。张序也将其归为刘侗所作，可见于氏的著作权当时即已处于若明若晦之间。^⑦遍考诸家书目，只有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别志类下著录《燕京古迹》一卷，装成一本，未知是否即此书。不过徐目将该书排在《景物略》后，二书当有渊源。^⑧

于奕正之子于藻入清后任江西庐陵县（今江西吉安）知县。在任上于康熙九年（1670）

① 参见于奕正遗稿顾梦游序，《因树屋书影》卷5，《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34册，第381页。

② 参见黄鸣：《〈帝京景物略〉的世界——刘侗的情感空间》，《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22页。

③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5《进士给假》，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中册，第403页。

④ 参见张次溪：《〈帝京景物略〉的著者和它的版本》，《北京史论文集》第2辑，第250页；《帝京景物略》出版说明，“北京古籍丛书”，北京出版社，1963年点校本，第3页。

⑤ 参见张次溪：《〈帝京景物略〉的著者和它的版本》，《北京史论文集》第2辑，第257—259页。

⑥ 张自烈：《芑山文集》卷12《燕京古迹序》，“丛书集成续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88册，第158页。

⑦ 张自烈《燕京古迹序》：“忆先是余友刘同人，辑《帝京景物略》，驰走遍都市。”“丛书集成续编”，第188册，第158页。

⑧ 参见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卷6，《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20册，第942页。

修成《庐陵县志》，邀请上司施闰章作序，施序褒扬了于奕正、于藻父子致力于保存地方历史文献的家学传承：“于君之尊甫司直先生，阅览好古，尝刻《金石录》《帝京景物略》，传之四远，而慧男（按，于藻字慧男）世其家学，喜为故旧表章遗书。”^① 本文第一节中提到，徐乾学为刊行于康熙二十六年的《日下旧闻》作序，竟误以刘侗为《景物略》唯一作者，与施闰章称许于奕正“刻《帝京景物略》”之说对读，可见即使是施闰章这样的名诗人，在鼎革之后也不太能准确判断《景物略》的纂作性质，遑论年代更晚的徐乾学，徐氏的误会也在情理之中。

结 语

于奕正在京郊自有产业，师从与公安派有密切关系的学者陶奭龄，喜好踏勘山水碑刻，他的诗歌创作和金石学研究由此而生。竟陵派领袖谭元春因其诗名与之订交，于奕正由此深入竟陵派和复社圈子，在他早期游历笔记的基础上，与竟陵派重要成员刘侗合作纂成《景物略》。此前与外地友人讨论诗艺、交换金石拓本和商略纂写《景物略》的经验，又激发了于奕正的壮游之思，促使他与刘侗携带该书稿本，一起南游秣陵，谋为刊刻。可惜天不假年，他们仅完成了流传至今的《景物略》崇祯八年初刻本，并未完成计划中的《南京景物略》。

四库馆臣评价《景物略》“采摭颇疏”“考据亦多不精确”，于氏所致力者原在金石谱录，刘氏主修《春秋》，皆不以地理名家，考证不精的批评固所难辞。《提要》又认为“所附诸诗，尤为猥杂”^②，在今天看来，这种做法很大可能是遵循万历年间蒋一葵《长安客话》诗文结合的体例，清代中期学者强行用后代标准衡量前代文献，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景物略》在材料方面旁通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成书体例下启朱彝尊《日下旧闻》，是北京史地文献的重要传承节点，更是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的重要史料。今后如能在此基础上深入考索《景物略》与《梦余录》等书的内容继承，当有助于我们从书籍史视角更深刻地理解明代北京地方史文献的生成、北京旧志与地方文献的关系等诸多问题。

（作者单位：北京市方志馆，北京语言大学）

本文责编：周 全 宿万涛

① 施闰章：《学余堂集·文集》卷2《志谱序·庐陵县志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7册，第15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77《史部·地理类存目六》，上册，第672、673页。